

先秦两汉卷

中国 传播史

李敬一◎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播史

· 先秦两汉卷 ·

李敬一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 / 李敬一著.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12

ISBN 7-307-02339-3

I. 中…

II. 李…

III. ①传播—历史—中国—先秦时代 ②传播—历史—中国—汉代

IV. G206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430033 武汉市汉口汉西路150号)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插页:4

字数:224千字 印数:1—2500

ISBN 7-307-02339-3/G·318 定价:16.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印刷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多卷本《中国传播史》之一卷，又是一部独立的学术专著。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传播学、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借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中华民族传播的起源，及先秦两汉的传播历史和传播方式进行了综合考察，对古代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作了系统研究，进而阐明了传播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传播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对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贯彻党在新时期的新闻、宣传思想，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进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选题有开创性，资料丰富、翔实，理论分析深刻，视角独到，时有新见，文字精雅、流畅。适合高等院校新闻学、社会学专业的师生，广大新闻传播工作者，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爱好者阅读。

ABSTRACT

This book is a part of the multivolumed works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a separate academic work.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by reference to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cultural studies and other related subjects, the author made overall inquiri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ies in the Pre-Qin Days and the Two Han dynasties. He also conducted a systematical study of the concept and idea of the 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studies, the author clarified the tie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the nation'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tie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China's social evolution. The book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ith respect to inheriting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our people, constructing theories of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concerning journalism and publicity, maintaining rightful orienta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and further

promoting China's social reforming,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vancement.

The book is a pioneering study in the field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identification with abundant and solid references, intensifie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unique perspective. With its frequent insights and accurate and fluent wordage, the book is to be well appreciated by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of journalism and sociology, mass practitioner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workers of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other people interested as well.

序

王 晨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大众传播方面的素材与篇述。作为研究人类传播行为、传播手段、传播理论以及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播学，是近五十年才诞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传播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学者曾从传播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对我国自身的传播历史、传播方式、传播观念，尤其是对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李敬一同志提出了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等有益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做了一件有一定开创性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该书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应用传播学、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借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对中华民族传播的起源，及先秦两汉的传播历史和传播方式进行综合考察，对古代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作了系统研究，进而阐明了这一时期的传播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传播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内容都

是有价值的。

该书作为对广义的社会大传播的历史和理论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些地方述前人所未述。这些论述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中国古代传播，也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对于具体的传播方式，作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述中有评，见解独到，有些看法对研究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在新的时代，中国新闻研究正逐步迈向一个新的高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予新闻从业者许多新的观念，新的思考，新的信息。如何从中国古代传播学理论中汲取营养，丰富我们的思想，为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服务，这是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思考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应用传播学的基本原理，解剖中国的社会传播这只麻雀，从而正确阐述中国社会传播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传统、规律和特色，不仅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需要，而且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对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繁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期望该书的出版能对新闻理论研究有所推动，对新闻实际工作有所启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序

——读《中国传播史》感言

何 微

我幸运地做了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李敬一先生所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的第一读者。作者还嘱我读后写篇序言，我慨然答应。

李敬一先生对我国传播的起源，以及古代传播的理论、思想，传播的方式，传播的技巧与控制作了综合论述，对传播中国化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些都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个性，会给读者以启迪！

关于“先秦两汉传播史”专著，在此以前，我尚未见到这方面的报道。无疑，李敬一先生的专著是首创者，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研究是一项重要贡献。由此引起我的许多思考。

1986年秋，武大新闻学系和武大新闻学研究所，在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史时，便发现一个缺环，缺少新闻思想发展一环。后来在几位研究生的努力下，广泛搜集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新闻学文献、资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初步编成《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约五百万字，作为研究生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参考读物。随后又发表了几篇有关研究论文，在新闻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的新闻院系尝试这方面研究和教学。武汉

大学新闻学院一直坚持下来，并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事实说明，一切贵在坚持，坚持就能赢得胜利。

李先生在《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绪论”中说：“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传播，没有传播就不能构成社会。传播与人类社会共生，又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个观点完全正确，并将其贯穿于全书，这如同一棵大梁有力地支撑着广厦一般。

距今约三百万年前，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中国就有人类分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北起辽宁，南至云南，均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并以劳动创造自己的文化。人类首先创造了石器文化，陶器文化。这些文化在缓慢地却有序地进行传播活动。这里所说的有序性是指从一处文化遗址的器物型制、器类的组合、文化类型的前后承袭关系，文化层的上下叠压关系中揭示一种文化类型的有序发展，反映出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

华夏大地从远古时代起，已有新闻传播活动。原生的新闻职能就是表述事实，传播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先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时传播的手段十分简单，使用手势、呼喊、火光、符号等。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是由原生职能所决定的。在新闻传播思想发展中，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先秦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忠于事实，直书其事，并逐渐形成我国新闻传播的优良传统。周王朝初年，鉴于夏桀、殷纣灭亡的历史教训，《尚书·周书》中作出既从天命又重人事的决策，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舆论环境比较宽松，史官在记录“人事”方面尚未遇到太多麻烦，这有利于发挥史官记事的传播作用和舆论监督作用。毕竟先秦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一些统治者对记事史官履行其舆论监督的职责，也采取一些控制措施。史官仍能客观地记录所发生的事实。如晋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引起赵盾的不满，董狐却理直气壮

地予以驳斥。又如齐史官兄弟二人相继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被崔所杀，其三弟仍无所畏惧直笔书之。这两件事，至今仍是我们的新闻传播活动的楷模。正如李敬一先生专著中所言：“几千年来中国史学家们所引以自豪的良史精神，它属于史学原则和道德文化，但同样属于传播文化、新闻道德范畴”，“显示了古代舆论传播的监督作用”。作者对古代史官记事传播活动作了正确的评价。

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中国新闻传播活动，毕竟植根于华夏这片沃土之中，并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一、时间跨度长；二、资料分散；三、认识分歧。写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史，工作难度很大。李敬一先生研究探讨我国传统文化给传播史留下了哪些“胎记”，认真分析它继承了哪些精华，这对于我们更新观念，推进新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思想史，显然是有益的。

要打开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局面，不要把新闻传播活动当作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应视为整个文化传播的一个侧面，充分吸收诸如古人类学、考古学、甲骨金石学，以及古代社会研究的新成果。史书载，东汉流行“蔡侯纸”。蔡侯即东汉宦官蔡伦，曾为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在他主持下制造的器物莫不精工。蔡伦造纸因此留芳千古。然而，田野考古发现，不断对一些历史记载作出挑战。10年前，甘肃省天水县放马滩西汉初期文景时期墓葬中出土了纸质地图。纸由植物纤维制成，薄而软，表面光滑平整。这张可绘制地图的纸的残片，不仅年代更早，而且纸质细致，是现在世界古纸最重要的标本。我们没有必要为蔡伦难过，他总结了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开始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亦是重要贡献。当然，我们也应该对蔡伦之前的造纸工匠表示敬意，他们的发明被人类广泛应用两千多年，为科学技术和文化传播作出了莫大贡献。我们深信华夏大地上埋藏着无数辉煌的遗迹，我们的传播史亦需要追寻古老中国文明的史迹，每一次的考古发现，

都会给传播史增添几分光彩。

这是我读《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的一点感受，写出奉献给读者参考，同时对李敬一先生专著的出版表示祝贺！

1996年10月20日于西安

前 言

传播学是近五十年方才兴起的一门新学科，传播学研究是一个热门课题。在我国，传播学研究日渐深入，已经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表现为对传播学基本原理的阐述，而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进行研究者则为数甚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在 70 年代末发表的工作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总结发展中国家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经验教训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它们自己关于传播的发展和结构的研究计划，一直使用从外国进口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这些研究工作一般是由外来的或者是在国外接受培训的专家进行的。他们用来对待他们国家的传播问题的方法，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都不一定符合发展中世界所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显然也存在上述情况。而人类社会传播事业的发展证明，当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一个民族，传播事业的发展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因此，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也不应当完全照搬国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分析、有批判地参考、借鉴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本国实际，开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

基于这一认识，我尝试着从传播历史和传播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民族在传播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特色。恰逢 80 年代中期武汉大学新闻系招收“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需开设有关课程。于是我结合硕士生教

学，作了一些资料准备工作。90年代以来，我先后指导过11名硕士生，并且分别给全系93、94、95级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研究》，将我对中国古代传播问题的一些思考撰写成讲义，于是便有了《中国古代传播史》（先秦两汉卷）这本书。

拙作所论问题，学术界鲜有涉及，而就我的学力也是难以做到精辟、允当的，我只是试图作一点探索，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大方之家去完成。尽管如此，学术界许多老前辈及新闻界的不少实际工作者却给了我很多关怀和鼓励。

著名新闻理论家、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何微先生，以81岁高龄亲自审读本书，并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读〈中国传播史〉感言》，肯定我撰写的《中国传播史》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个性，会给读者以启迪”，是“首创者，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研究是一项重要贡献”。何老认为：“写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史，工作难度很大。……研究探讨我国传统文化给传播史留下了哪些‘胎记’，认真分析它继承了哪些精华，这对于我们更新观念，推动新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思想史，显然是有益的。”何老还对本书具体章节的论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如：认为传播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观点完全正确”，“作者对古代史官记事传播活动作了正确评价”等等。何老又以他的渊博学识，为本书补充了不少新的考古资料，并提出要“充分吸收诸如古人类学、考古学、甲骨金石学，以及古代社会研究的新成果”等卓越的见解。这些，都给我以许多启发。

著名高级记者、《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他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肯定拙著的出版是“做了一件有一定开创性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关于拙著的内容，王晨同志鼓励说，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些地方述前人所未述。这些论述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中国古代传播，也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者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述中

有评，见解独到，有些看法对研究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王晨同志还认为，开展对中国古代传播理论研究，“是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对于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繁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毫无疑问，王晨同志的序言是对拙著主题思想的提升。

如果说拙著本身的内容给读者的启发有限，那么，读者从何徽教授和王晨总编的序言中一定能获得教益，这也就弥补了拙著的不足。在此，谨向二位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副总编杨小岩教授和编辑室主任蔡先保副教授审阅，他们从书的内容到形式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书的质量有进一步的提高，令我感激不尽。应该说，本书凝聚了责任编辑的大量心血。

本书曾五易其稿，在撰写过程中，部分同志在统一的写作大纲基础上，参与了讲义的整理和初稿的起草工作，他们是：左彦（负责第六章、第七章）、刘兰珍（负责第八章）、崔朝阳（负责第九章、第十章）。因此，本书的成型，也包含着他们的劳动，特作说明。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武汉大学出版社各位领导的关怀。同时，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吴高福教授、党总支书记刘俊昌副教授以及院、系其他领导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有效的帮助。在本书付梓的时候，谨向各位领导和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我着手撰写《中国传播史》后几卷的时候，我期待着读者对“先秦两汉卷”的批评。

作者

1996年10月于武昌珞珈山寓

目 录

前言	(1)
----------	-----

绪论 —— 关于传播学中国化的思考	(1)
-------------------------	-----

一、传播、传播学与传播学研究	(1)
----------------------	-----

二、“传播学中国化”的内容	(2)
---------------------	-----

三、关于先秦两汉传播史研究	(15)
---------------------	------

第一编 先秦传播

第一章 上古的传播方式	(18)
-------------------	------

第一节 传播的起源	(18)
-----------------	------

第二节 口语传播	(21)
----------------	------

第三节 谣谚传播	(23)
----------------	------

第四节 文字传播	(27)
----------------	------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方式(上)	(34)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传播发展的背景	(34)
-------------------------	------

第二节 采诗观风	(37)
----------------	------

第三节 置邮传命	(48)
----------------	------

第四节 烽燧警报	(51)
----------------	------

第五节 乡校议政	(56)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方式(下)	(61)
第一节 史官记事	(61)
第二节 游说诸侯	(66)
第三节 聚徒讲学	(76)
第四节 著书立说	(81)
第五节 街谈巷语	(83)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思想(上)	(87)
第一节 儒家的传播思想	(87)
第二节 道家的传播思想	(99)
第五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思想(下)	(115)
第一节 法家的传播思想	(115)
第二节 墨家的传播思想	(122)
结语 —— 先秦传播与社会发展	(129)

第二编 秦汉传播

第六章 秦代的传播方式	(136)
第一节 驰道交通	(136)
第二节 同文传播	(140)
第三节 明堂计量	(142)
第四节 民族融合	(144)
第七章 秦代传播与王朝兴亡	(147)
第一节 传播——秦政权崛起的催化剂	(147)
第二节 秦王朝的社会控制	(151)
第三节 开放与封疆——关于长城的再认识	(153)
第四节 “焚书坑儒”与传播体系的毁灭	(156)
第八章 西汉传播	(159)
第一节 广而告之——楚汉战争中的“约法三章”	(159)